

文章编号: 1005-0523(2009)02-0135-06

叶维廉语法诗学探微

高翠元

(华东交通大学 教务处,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叶维廉以语法为中心,深入剖析了中西诗学不同的特质,并深刻阐释了中西语法背后各自迥异的哲学根基。在此基础上,叶维廉对突破西方传统语法体系、具备中国古典式审美效果的西方现代诗进行了探讨,推崇一种回到现象、回到具体的感性诗歌语言。他这种以语法为中心、以哲学为根基、以诗歌审美效果为界标的完整而精妙的语法诗学体系无论是对于中西诗学、文学的比较研究还是对于我们探索中国诗歌或文学的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语法;中西诗学;哲学根基;语言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传统的诗学多从语义、格律以及对仗等角度来探讨诗的表现,基本缺乏语法方面的探究。这主要是因为古人对语法现象缺少应有的重视,他们对语言现象的把握主要集中在文字、音韵和训诂三个领域。直到《马氏文通》的出现,西方系统的语法理论才传入中国。此后,中国的语法研究如燎原之火,一发而不可收。但在诗学领域,语法的研究却只是星星点点,不成气候,名家大作亦告阙如。值得欣喜的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先生填补了语法诗学的空白,他对语法与诗的表现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创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语法诗学体系。我们应当吸收其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为我们当代诗学的建设提供一份宝贵的理论资源。

1 比较视域中的中西诗学

在叶维廉看来,中国文言的语法较之印欧语系的语言具有大得多的灵活性和自由性。以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为例: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显而易见,要把这首诗翻译成英语,需要增加许多的元素,“如主词如何决定动词的变化,如单数复数如何引起动词的变化,如过去将来现在的时态如何引起动词的变化,如冠词如何特指”^{[1]79}等。叶维廉指出,英文在这些方面是非常严谨、细分的,没有这些元素便不能成句,有了这些因素句子便可以因词性而定向、定义。英语中的这些法则,其任务就是要把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指定、澄清、说明。然而文言却并不一定要冠词,也不需要人称代词作为主语,甚至不需要连接元素如介词、连词而自然成句。另外,像英文里的主语—动词—宾语的结构,在文言中也有,但这种结构并非必须完整,可以没有动词也能成句,像

收稿日期: 2008-10-22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作者简介:高翠元(1980-),湖南怀化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便是其中的典型，而这种句法在英语中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文言中许多词都可以兼含数种词性，如“野旷天低树”中的“低”字，既可以是形容词（做树的修饰），也可以是动词（压低）。叶维廉认为正是中国文言语法的这种高度的灵活性造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审美效果，他对此作了极为详尽而精到的分析，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叶氏认为，无论是人称代词的运用，还是时间状态的限定，抑或是语法结构的分析性倾向，印欧语系的语法都显露出以自我的观点强加于自然现象的思维习惯，而中国古典诗歌则反其道行之，诗人在诗中隐退自己，不对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特别的限定，达到一种“无我”或“忘我”的境界。如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必用人称代词，像“移舟泊烟渚”一句，其中并没有指明“谁”来移舟，是诗人自说的“我”吗？既是亦不必是。由于超脱了人称代词“便使词境诗境普及化，既可以由诗人参与，亦可由你我参与，由于没有主位的限指，便提供了一个境或情，任读者移入直接参与感受”。^{[1]83}同时，文言也没有时态的变化，这样就不会把诗中的经验限指在一特定的时空，从而使我们更接近浑然不分主客的存在现象本身，因为存在现象是不受限于特定时间的，时间的观念是人为的，机械地强加在存在现象之上。而从语法结构来看，印欧语系的语言较之文言有着极强的分析性趋向。他以李白《送友人》诗中“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两句为例，列出 Giles 和 Bynner 的英译分别如下：

Where blue hills cross the northern sky
Beyond the moat which girds the town
—— Giles

With a blue line of mountains north of the wall
And east of the city a white curve of water
—— Bynner^{[1]65}

他指出在原诗中，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到自然事物本身直接地向之呈现，而在英译中，读者则是被“where”和“with”之类知性的、指导性的字眼牵着鼻子走，在英译中，读者看到的是知性的分析过程，而不是原诗里事物在读者面前的自然的显露。在英译里，由于插进了知性的指引，读者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叙述者向他们解释事情。而中国古典诗中诗人在诗中的隐退消解了读者与物象之间的距离，使得读者可以自由的出入其间，参与到诗歌审美境界的创造中来。

第二、中国古典诗歌中文言连接媒介的减少使物象具有强列的视觉性、具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这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充满了电影蒙太奇式的叠象美。叶维廉以晏几道《临江仙》中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一句为例，认为不应把它解读为“落花里有一个人独立着，微雨里有成双的燕子在飞”，因为“在文言的句法里，景物自现，在我们眼前演出，清澈、玲珑、活跃、简洁，合乎真实世界里我们可以进出的空间。白话式的解读里（英译亦多如此），戏剧演出没了，景物的自主独立性和客观性受到了侵扰，因为多了一个解说者在那里指点、说明落花‘里’，‘有’人……”^{[2]19}而正是由于古典诗歌中充满大量这类无需连接媒介的罗列句式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充满了电影蒙太奇式的叠象美。蒙太奇是个电影术语，也就是将两个不同的镜头并置，组合成一个全新的整体，而它并不等于一个镜头加另一个镜头的总和。叶维廉举杜甫《春望》中“国破山河在”一句为例，他认为诗人将残破的城池与不变的山河两个画面并置，诗人无需说明和解释，读者便能感到两个意象并发所构成的对比和张力，在这两个并发的意象之间潜藏着许多可能的感受和解释。而如果按照英语的语法，在其中加上 *though yet but* 之类的连接词，原诗的这种蒙太奇的效果则可能被破坏殆尽。

第三、中国文言通过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使视觉事象共存并发，从而凸显空间张力的玩味、绘画性、雕塑性。叶维廉指出，杜甫《春宿左省》中“星临万户动”一句，“星临”可以说是时间的征兆，但这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如果把其理解为“当星临之时”，那就会把事象活动的具体意味贬为从属的位置，将其空间玩味破坏无疑。而叶维廉对王维《终南山》的分析则更为典型，兹举如下：

太乙近天都 (远看——仰视)
 连山到海隅 (远看——俯仰皆可)
 白云回望合 (从山走出来时回头看)
 清霭入看无 (走向山时看)
 分野中峰变 (在最高峰时看,俯瞰)
 阴晴万壑殊 (同时在山前山后看——或高空俯瞰)
 欲投人宿处 (下山后,同时亦含山与附近的环境的关系)
 隔水问樵夫^{[1]97}

在这里,山的重实感由于空间的时间化或时间的空间化而变得可感可触。山也似乎成了一件雕塑品,可以任由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从而使读者获得不同的观感。

第四、由于文言语意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往往充满了多重的暗示性。叶维廉指出,“松风”,“云山”等中国古典诗中常见的词语,英语往往译作 winds in the pines(松中之风)或 winds through the pines(穿过松树的风); clouded mountain(云盖的山), cloud like mountains(像云的山)或 mountains in the clouds(在云中的山),然而云与山,松与风之间的空间关系是非常不确定的,它兼有以上几种情况,而又不止这些。而英语却把物象并发(亦见松亦感风,亦云亦山)的全部环境缩改为单线的说明。

2 语法背后的哲学根基

在叶维廉看来,印欧语系的语言在语法上注重分析、十分严谨,而中国文言的语法的不重分析、非常灵活,这与中西方所特有的认识论和宇宙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叶维廉认为西方思想里最终极的病源乃是“‘自我’用种种妄自尊大的形式去侵占原有世界的行为”。^{[1]156}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现象和本体两大部分,外在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外在世界的“现象”只能是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即本体)的幻影。他曾把知识分为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直观。他认为直观所见到的现象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断变化的事物没有价值,不能成为真理的依据。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最高层次的知识是超知觉的,用纯粹的智知对神明的理念作冥思,所谓“真理”即存在于这个超越具体世界的抽象的本体世界里。唯有哲思,而不是观感,才可以参透理念的世界。到了亚里士多德则以推理的方式建立起“地球中心说”的宇宙观。然而这个宇宙体系从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假设的”,“虚构的”宇宙秩序,并不是真实世界的秩序。但它却垄断了西方整个科学思维的发展,直到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才被打破。这也可以说明西方人以知性来驾驭宇宙秩序的偏向。这种把人的自我提升到垄断和主宰原有真实世界的高位的趋向,并没有因为“地球中心说”的打破而得到改善,反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歌猛进。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体两面。所以叶维廉认为:“西方所谓的真理(不管是抽象的理念世界,还是宇宙运行的法则),说的只是真理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假设’,是人为的一些结构代替了真实世界的本身。换言之,柏氏在他的知识层次里,把秩序的重心放在人的思维里(不是放在外物),他创造了‘理念世界’来与‘所谓’凌乱无序的全体物象来抗衡;他这样做已经使人与他的原有的根据地疏离,人已经无法视自己为万象成化的元素之一,而视自己为万物秩序的型范。”^{[1]150-151}

当然,叶维廉也承认在西方的传统中也存在着对这种倾向的反动,“即就柏拉图的对话记录里,便曾有对语言不信任的故事,而中世纪至文艺复兴以来,对基督教义袭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模子,也曾有过质疑;及至‘太阳中心系’的确立,更曾对理性作大幅度的批判”,但“作为对知识追求的架构,其间所采取的立足点,运思的工具与方向,范定或圈定意义的方式,则是始终坚牢未变……即就反对康德的‘超验自我’而走向历史实证主义狄尔泰,也无法不借助于康德所倚重的自然科学的解释程序,去组合生命潮汐所提供的经验素材。”^{[2]43-44}

然而,在叶维廉看来,中国的道家思想却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传统截然不同的哲学进路。“道家哲学首

先拒绝把人为的假定视作宇宙的必然”，^{[2]91}道家认为用知性得出的概念化的宇宙秩序不过都是一些假象，因为这些人为的假定是以偏概全，是把浑然的整体分化了，简化了，甚至将其原样歪曲。叶维廉认为庄子下面这段话便是其观点的最好注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亏也。（《庄子·齐物论》）

叶维廉认为道家深刻地体悟到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因为它本身就是分封的一种活动，它会把完整的天机分化破碎为片段的单元，“语言既无法包孕宇宙现象生成的全部”，“亦无法参透肉眼看不见的物之精微”。^{[1]132}因此，道家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56章）。在叶维廉看来，道家这种对语言局限性体认的背后还深藏着一个更为根本的体验，那便是认定人只是万象中之一体，是有限的，不应该被视为万物的主宰者，更不应该被视为宇宙万象秩序的赋予者。“我们怎能以此为主，以彼为宾呢？我们只是万物运作中的一体，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把它们分等级？我们怎能以‘我’的观点强加在别的存在体上，以‘我’的观点为正确的观点，甚至唯一正确的观点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是如井中之蛙，视部分的天空为全部的天空吗？庄子要‘齐物’，就是要把一切存在物一视同仁地尊重，物各具其性、各当其分。”^{[1]135}与这种体认相应，道家认为真实的世界是无需人的自我去管理和解释的，是完全活生生、自动自发化自真的，即所谓“无言独化”。

因此，道家也就特别重视概念、语言、觉识发生之前的无言世界的历练，在这个最初的接触里，万物万象，质样具真地，自由兴发自由涌现。因此，也就有庄子对“未知有物”的“古之人”的极力推崇，同样，老子也呼吁“复归于婴儿”（《老子》第28章），回到童真与万物之间无碍的应和。基于上述的认识，道家主张主体应当“虚而待物”（《庄子·人间世》），抛弃“我”的负累，敞开胸襟任万物自由穿行、活跃、驰骋，庄子的“心斋”，“坐忘”，“丧我”都是这个意思。

总体看来，叶维廉认为中西哲学的歧异可以归结为观物方式的差别，即“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的区别。“前者以自我来解释‘非我’的大世界，观者不断以概念、观念加诸具体现象事物之上，设法使物象配合先定的意念；在后者，自我融入浑一的宇宙现象里，化作眼前无尽演化生成的事物整体的推动里。去‘想’，就是去应和万物朴素的、自由的兴现。”^{[1]136-137}“以我观物”的西方思维也自然倾向于用分析性、演绎性、推论性的文字或语句，倾向于用直线串联、因果律的时间观，由此端达到彼端那样刻意使意义明确地界定；而在“以物观物”得思维方式熏陶下的中国诗人在运用语言时，当然就可以很轻易避开限指、限义、定位、定时的元素，不把自我所发明的、所决定的意义结构与系统生硬地透射入素朴的万物里。“语言文字仿佛是一种指标，一种符号，指向具体、无言独化的真世界。语言，像‘道’字一样，说出来便应忘记，得意可以忘言，得鱼可以忘筌；或化作一只水银灯，把某一瞬的物象突然照得通明透亮。”^{[1]143}同时，他们也倾向于以非串连性的、戏剧出场的方式，任事物并发直现，保持物物间多重空间关系，避免套入先定的思维系统和结构里。

3 西方现代诗与叶氏语法诗学体系的核心观念

与对中国诗歌的语法探讨相对应，叶维廉还从语法与哲学观念的角度对西方现代诗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西方现代的思想是“极力要推翻古典哲人（尤指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抽象思维系统而回到具体的存在现象”^{[1]101}。他对佩特（Walter Pater）、赛孟慈（Arthur Symons）、休默（T. E. Hume）、庞德（Ezra Pound）、等现代诗人的美学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他看来，他们都一致主张以具体的物象来代替那种概念化的世界，代替妄自尊大的自我建筑。佩特就主张“瞬间经验的美学”，休默则主张诗的语言应成为“视觉的具体的语言，……一种直觉的语言，把事物可触可感地交给读者。它不断地企图抓住我们，使我们不断地看到一件实物，而不会流为一种抽象的过程”，而庞德也曾声明：“诗人找出明澈的一面，呈现它，不加陈述”^{[1]103-104}。

但是,他们的理想是语法严谨而有细分说明性的英语所无法达成的。他们只有打破固有的语法才能达到具体的表现。叶维廉对英美现代诗人在诗歌语法的突破上所做的努力也同样作了详尽的分析。为避免琐碎,兹举其对庞德和威廉斯的两首诗的分析来加以说明。我们先看庞德的“*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1]109}

很明显,按照英语语法的常规,在 crowd 和 petal 之间应该加入 are like 或 is like 这样的词语,然而庞德却将其去掉,切断了语法,这样做的效果便是使两个视觉视象独立而明澈。而威廉斯以下这首诗则采用了空间的切断:

(a) So much depends upon a red wheel barrow
glazed with rain water besides the white chickens

(b) so much depends
upon
a red wheel
barrow
glazed with rain
water
beside the white
chickens^{[1]111}

叶维廉认为该诗所采取的空间的切断提高了读者感物层次的每一刻的视觉性,“每一个字因此可以从直线发展的限制下解放出来,而这些独立的事象与瞬间使得我们能从不断变换的角度来观同一的物象”^{[1]112}。

在叶维廉看来,正是通过上述的努力,西方现代诗在审美效果上与中国古典诗歌实现了汇通和交融,本文在第一部分所提到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色大部分对西方现代诗也同样适用。然而西方现代诗中的物象对读者来说不但不熟识,反而往往是孤绝异质的,读者常常要煞费心机方能进入诗境。因此,与中国诗之“不隔”“无碍”截然不同。其原因正在于西方现代诗人“仍旧以自我或自我意识为一切秩序的中心,而把原来的真世界改容放逐”^{[1]156},便使得他们依然无法真正从语言的牢笼中解脱出来。

在上述对中西诗歌审美特征与语言策略的比较中,其实就已经间接地展示了叶维廉自己的诗学观点。叶维廉将中国道家的思想和西方詹姆士、柏格森、怀特海,尤其是海德格尔等人所代表的反对理性的抽象,回到现象,回到具体的经验世界的哲学思潮糅合为一体,从而形成他自己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个体系最根本的观念就是把直观置于理性之上,在直观中呈现的是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一旦加入了理性,便将这种真实缩减和歪曲。他说:“在注意及决定事物的状态和关系之‘前’的一瞬,亦即‘指义前’的一瞬,是属于原来的、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超乎人的接触、超乎概念、超乎语言的;‘指义’的行为,则是属于以语、义运思的我们(观、感的主体),居中调度和裁定事物的状态、关系和意义。指义行为,是从原来没有关系决定性的存在事物里,决定一种关系,提出一种说明……指义行为亦包括和事物接触后引发出来的思考行为。这种行为,基本上是对直现事物的一种否定,一种减缩,一种变异。”^{[1]125-126}很明显,“在注意及决定事物的状态和关系之前的一瞬”指的是人们对事物作理性的界定之前纯粹直观的状态。他还曾借对道家思想的评论表达对理性的不满。

宇宙现象整体运作的演化生成是超乎人智与语言,道家早就悟到。与其把“知”的可能放在人智,一步步远离真实世界,与其用概念对万物之为万物、对其自然生发衍变质疑,反不如对这些质疑的行为本身质疑。因为人的假定不可以成为宇宙的必然,实在是不辩而明的;所有意图以抽象的意念圈定、范定方式去类分天机都是徒然的,都是限制、减缩、歪曲、片面不全的,都是不可靠的假象。^{[2]144}

出于这样的认识,叶维廉认为诗歌语言的任务就是要恢复我们最原有的根据地,也就是那个“思”之

前事物具体、感性的存在,他说:“要认识到,‘指义前直现的事物’,既然是宇宙整体不断推移不断成化的一部分,欲保存它们的真样,必须让它们既是‘直现的具体’,也是‘未加名义的空纯’,让它们孕含在融汇不分的浑一里。”^{[1]130-131}而这种语言自然也就应当像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所做的那样,尽量减少其中分析性、指义性的因素,“将知性的减弱到最少的程度”^{[2]266}。

4 结束语

总体看来,叶维廉以语法为中心向前连接宇宙观、知识论以及观物方式,向后接通诗歌的审美表现,从而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语法诗学体系。它对我们探讨中西诗歌以及中西文学的特质以及各自的美学、哲学背景是非常有启发的。同时它也为我们探索诗歌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但它却同样存在一些问题。西方古典哲学抬高理性而贬抑感性,叶维廉对此作了颠倒,这样做到底有多大的合理性?感性比理性更趋近于事物的真实状态吗?恐怕这也不过是一种偏见。即使是在诗歌创作这样充满感性的活动中,也并非理性越少越好,只不过理性是融会在感性之中而不显其迹罢了。也正因为如此,导致叶维廉抬高传统而贬抑现代,抬高东方而贬抑西方。正如闫月珍所说:“把传统和现代看成截然对立的两面,一方面忽略了历史传统的传承性,一方面夸大了现代化的负面影响而反倒看不清现代化对传统的扬弃。因此,在批判西方文化时,把中国理想化、浪漫化和神圣化,往往陷入另一种自我中心立场。”^{[3]10}

参考文献:

- [1] 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 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2.
 [3] 闫月珍·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的现代阐释[J].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26(1):4-10.

An Exploration of Ye 's Poetics of Grammar

GAO Cuiyuan

(Dean Offic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aking grammar as the center Ye Weilian analyzes the different features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in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poetics. By breaking western grammar system, he also explores the western modern poetic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lassic aesthetic effect. advocates new poetic languages which return to the phenomenon and the concrete perceptual poetry language. His poetics of grammar which is grammar-oriented, philosophy-based, aesthetic and complete, has the important theory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literature contrast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poetry or litera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grammar; China and the western poetic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language

(责任编辑:吴泽九)